

鴻圖之定之才獨得靈寶之靈根
 金宮明見則能進退屈伸無欲
 之憂故已於政途之役登見大
 聖明化履我於至精之妙
 止冀力奮機而壽中天之雅興
 禮聘爲母之西席承振揚之英
 子至於研硯夫以佳楊之惠而
 才所以贊同也自琴瑟第一而
 宗

華人學術處境中的
宗教研究

本土方法的探索

若波羅黎志添

主編

目 錄

編者言（黎志添）

1 宗教學：探索華人學者的宗教研究方法

從宗教的“不可化約性”論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蔡彥仁） 015

宗教學對儀式研究方法的啟迪（黎志添） 046

循理以明情：中國宗教研究管窺（蒲慕州） 068

2 中國本土宗教研究

凶死與解除：三個台灣地方祭典的死亡關懷（李豐楙） 091

佛法詮釋學初探（學愚） 134

3 基督宗教研究：多元的研究方法

當《創世記》遇見中國洪水神話：希伯來聖經跨經典閱讀（李熾昌） 161

李提摩太對大乘佛教的回應：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及神學角度的評析
（賴品超） 179

雙重的父權宰制、自主的婦女發聲：從香港華人婦女基督徒口述歷史研究看宗教歷史研究（黃慧貞） 205

晚清基督教中文小說研究：一個宗教與文學的角度（黎子鵬） 227

4 華人學術處境下的伊斯蘭教研究

華人學術處境下的伊斯蘭教研究：以伊斯蘭教“吉哈德”為例
（沙宗平） 247

華人文化圈的伊斯蘭研究：議題與方法論的反思（蔡源林） 270

5 宗教比較：中西的不同視點

祿是道和傳教士的“中國迷信研究”（李天綱） 309

撰文學者簡介

參考資料

華人學術處境中的 宗教研究

本土方法的探索

黎志添——主編



責任編輯 梁偉基
美術設計 鍾文君

書 名 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本土方法的探索
主 編 黎志添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2 年 5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特 16 開（150 × 210 mm）36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35-7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編者言

在中國，從古至今，無論是在個人意識或是集體生活中，都充斥着對不可思議的神明世界的豐富想像與積極回應，它們一起構成了形成於現實與神聖之間的不斷往復溝通的宗教意義世界。然而，對於這些自殷周至現代都既存的宗教事實的認同，尤其是從“宗教研究”視角出發的學術研究工作的發展過程，卻可謂舉步維艱。若要究其原因，或許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講起。

首先，就學術傳統而言，現代宗教研究發端並成熟於西方學界；而在晚清以前的中國，既沒有歐洲人用以界定“religion”語義的概念，也沒有相應的定性辭彙。將西文的“religion”譯為中文的“宗教”，只是由於晚清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日本學術界對歐洲宗教問題的討論之影響而借用過來的。並且，當他們使用“宗教”這一概念時，也只不過是按照西方意義的宗教來理解，即是把“宗教”僅看成是神存論的領域，以及與出世間的超越存在相關聯的信念和信仰行為。¹這種狹義的宗教概念，不單限制了我們對宗教（尤其是中國民間宗教）的複合性質和多元價值的準確理解，也同時妨礙了華人學者對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的進展和方法理論的建立。

此外，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初現曙光的中國宗教研究，其特點卻是着重於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出發，並聚焦於某一種特定宗教之上。雖

然其研究成果亦不容小覷，²但中國學者始終缺乏從理論層面，建構出中國宗教如何作為人類一種獨立自主的經驗活動，與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及精神等活動領域之間的互相影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大量西方宗教學譯著的出版，見證了中國宗教學術研究發展的新階段，但這些譯著也只是局限於宗教哲學、神學、宗教社會學和宗教人類學等領域。可以想見，這批西方宗教學理論除了會對中國學者的宗教研究造成影響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劃定宗教學專業學子們的研究視域。事實上，中國學者應該接觸更多不同的西方宗教學理論，這將有助於我們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方意義上的宗教研究理論，並且應該更多注意到在西方發展成熟的“宗教科學”（*Religionswissenschaft*），強調探究宗教經驗的共同本質，以及那些隱藏在各種宗教傳統的神話、儀式和象徵之下反復出現的模式。

其次，從研究機構的建立與設置而言，近年來，大學制度下的宗教教學系及宗教研究所紛紛在中國內地各地成立，其成長勢頭令人頗為驚喜。但它們的一個共同點是作為一門二級學科的宗教學研究，往往被置於哲學研究的體制下，這種體制明顯阻礙了研究者擴大其具有學科自主性的宗教學研究進路。除了從哲學和歷史的角度對宗教進行研究之外，宗教學研究專業的課程設置常常忽視了“科學的宗教研究”領域，以及運用比較、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和文學等不同方法，研究複雜的宗教信仰和實踐活動。

最後，我們將看到官方的宗教政策對學術研究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只承認五大宗教的合法性，這樣的規定減少了學者研究其他宗教傳統的積極性與機會。例如，中國民間教派多

被加以“封建迷信”的標籤，不足以被稱為一種宗教；中國的天主教地下教會擁有六百萬至八百萬信徒，卻由於中國政府與梵蒂岡的關係以及宗教政策所限，而鮮有學者願意研究。可見，政府的宗教政策仍在繼續決定着中國宗教學術研究的範圍和特點。

即便有上述困難，華人學術界在宗教研究上所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進展仍是有目共睹的，這可以華人大學的宗教學系發展為例。近代中國大學的宗教研究，可以追溯至 1926 年，由美國及英國的基督教差會合辦，在燕京大學所建立的“燕京宗教學院”，但它基本上仍是一所由教會大學主辦、以基督新教研究為主而其他宗教研究為輔的宗教學院。³1949 年以後，在香港及台灣的教會大學，亦有相類似的宗教學系成立，例如 1951 年創立的崇基學院，自 1957 年起就開始開辦宗教教育及設立崇基神學院，其中的宗哲系在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後的 1978 年正式分家，宗教學系成為了大學的獨立學系；⁴台灣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於 1988 年設宗教學研究所，1992 年擴充為宗教學系並設學士班及碩士班。⁵在中國大陸，北京、武漢、四川、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學相繼成立宗教學系或宗教研究所，逐漸形成國內宗教研究的重鎮。

合辦此次“首屆華人學者宗教研究論壇”（2010 年 1 月 21-23 日）的四所院校，也是其中的翹楚。國立政治大學的宗教研究中心於 1996 年成立，1999 年開辦宗教研究所碩士班。北京大學於 1982 年即開設了本科宗教學專業，1995 年成立宗教學系，2009 年 11 月又成立了集合各院系專家的宗教文化研究院。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宗教學研究室成立於 1985 年，2000 年開始建立宗教學本科專業，2001 年成立宗教研究所。在兩岸三地的宗教學研究蓬勃發展之際，本論壇的舉辦既是學

界的有意之舉，又似是水到渠成之事。

首屆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會議主題定為“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共有來自兩岸三地四校學者的二十五篇論文發表，歷時三日，分為“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跨文化中的宗教研究”、“中國佛教研究”、“中國本土宗教研究”、“耶、佛、儒之間的文化交流”、“華人學術處境中的伊斯蘭研究”、“宗教與當代社會之變遷”、“宗教專題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九場主題討論，以及一場“專題演講”。會議論文及討論主題所涉範圍之廣，可見一斑。而如今在讀者手中的這本論文集，由於選題原因，僅選錄了其中的十二篇論文。雖難免有遺珠之憾，但其所涉獵的主題並未因此而縮減。其中既有宗教學理論層面的探索，也有對學者自身研究經驗，尤其是作為華人學者身份的反思；既有對中國本土宗教的考察，更有對在中國本土發展的其他宗教傳統的探索；既有傳統的宗教文獻研究，亦不乏田野調查研究；既有宗教傳統及其研究的歷史角度的評析，也包括文化、文學、神學等多元角度的分析。

目前在華人宗教學術界尚無以類似論題組織和編選的論文集，因此，本書的突出貢獻在於，嘗試從華人宗教研究學者的立場和角度，探索適應中國宗教特質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徑以及具體處境。本論文集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優點，為今後華人學術界的宗教研究提供了示範性意義：（1）理論反思與具體個案研究相結合；（2）對適合華人宗教的多元研究方法的探索；及（3）從當下具體處境出發，關注活的宗教對於中國人生活世界的實際意義。

作為論文集的開篇之作，蔡彥仁教授擲地有聲地指出，我們在探

討華人學術處境中的宗教研究之時，首要之務即須思考主體性問題，必須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界圍，標示自己的特色，提出其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而伊利雅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所認為的宗教的“不可化約性”，正可以作為釐定華人學者未來宗教研究走向的重要參照點。身處華人學術處境的我們，更要以“宗教性”為前提，確立宗教研究的客體，提出本地“宗教”的具體內涵。目前看來，建立共識，深化宗教問題意識，提出彼此可以共享的認知前提與進行方式，是仍處於萌芽階段的華人學者宗教研究界的當務之急。

同樣是受到伊利雅德觀點的啟發，黎志添教授的論文則認為，其關於宗教經驗、象徵語言和宗教儀式之間關係的觀點，也同樣為宗教儀式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也提示我們必須明白，儀式為信仰者揭示的是一個具有開敞性和轉化性的意義世界，這個意義世界是建立在一種雙向性的互動關係之上。界定和理解在人類生活經驗中存在的這種獨特的及普遍的對神聖或其顯現之感受，正是中國宗教研究學者的工作。

那麼，宗教研究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蒲慕州教授在論文中對自身成長背景的回顧，提醒我們要反省中國學者對其研究對象由上而下的態度，這或許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理性主義。但是當我們以中文語境為主，去瞭解“信”的意義時，卻發現它起初是一種相當理性而世俗的德行，後來才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宗教情懷的基本概念。如此，所謂信與不信之間的鴻溝，並非理性與非理性的差別，而是一種理性與另一種理性的差別。去除了理性的學者與感性的信徒之間的障礙，也許我們可以得到瞭解宗教感的更佳途徑，藉此瞭

解人們的信仰抉擇和信仰行為是在什麼樣的智識及社會背景或心理情境之下成立的，而不是去討論信仰內容的真偽問題。

李豐楙教授通過對三個台灣地方祭典的比較研究，為蒲教授的思考提供了生動的例證。他指出，知識精英對於三教之間的異同，比較關懷的是彼此的抗衡與融合，從而提出不同的“三教合一”方式；但民眾不同於知識精英之處，就是知識分子根據經典而闡述其“合一”的獨特形式，地方民眾則是需求儀式之間的相互競合，並不在意精深的義理，只是表現其“兼容”的宗教心態。民眾複合三教的方式，並非西方宗教學所界定的“融合”，而是從形式向義理的多元“複合”。

學愚教授對“佛法詮釋學”理念的思考，將我們的視野從田野調查拉回到了經典文本。他借鏡了現代詮釋學中的語言理念，分析佛教語言與佛法真理或終極關懷——涅槃的關係，探討語言文字的價值和功用。最後他指出，佛教承認語言文字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其相對性、乃至誤導性，因為它們不是真理本身。

同樣是經典研究，李熾昌教授則採用跨文本閱讀的方法，對聖經洪水敘事和中國納西族洪水神話進行跨文本的解讀，目的是要探究納西族洪水神話如何有助於讀者理解已被非神話化的聖經洪水敘事，並重構《創世記》第六章1至4節的神話片段。他告訴我們，跨文本閱讀方法之於聖經詮釋的意義在於，當我們將非聖經文本納入視野加以整體觀照時，那些聖經經文中經常被忽略的細節也會變得清晰起來。

李熾昌教授的論文已引領我們進入了東西不同文化相遇的處境，而李天綱教授和賴品超教授的兩篇論文正是不約而同地處理了西方傳教士對東方文化的詮釋與研究。李天綱教授的論文以十九、二十世紀

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處理中國民間宗教的例子，幫助我們瞭解西方人的“中國觀”。其中，在華耶穌會士繼承了本會先驅利瑪竇的“漢學”傳統，與法蘭西學院等國家科研機構內的“漢學家”們合作，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科學研究，法國人祿是道神父的《中國迷信研究》就是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們已經從論證“基督教中心論”、“西方中心論”的領域中脫離出來，轉而對於中國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幫助西方人正確看待“東方”，以矯正西方人的“偏見”。

賴品超教授則以李提摩太對大乘佛教的詮釋為例，指出其詮釋雖然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所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受到他的宣教使命所驅使，但他的進路仍是迥然不同於具殖民色彩的東方學進路，反而在動機和態度上更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賴教授由此進一步反思，某種程度上的“東方主義”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在宗教研究中，並沒有完全客觀中立的立場，所以對“其他人的宗教”的一個負責任的再現方法，就是盡可能清晰明確地說明詮釋者自己的立場與前設。此外，圈內人（insider）的詮釋不一定比圈外人（outsider）的詮釋更為可靠，而圈外人之中，那些沒有特定宗教背景的人的詮釋，也不一定優勝過具有別的宗教背景的圈外人的詮釋。這三類研究者都可以各自有不同的假設甚或偏見，並且三者之間更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互動，不能先驗地（a priori）認為哪者的詮釋一定最可靠或最不可靠。

除卻上述論文所展現的基督宗教的研究方法之外，黃慧貞教授和黎子鵬教授的論文又為我們提供了文化、文學的多元研究視角。黃慧貞教授從其進行的女性主義口述歷史計劃中取材，娓娓道來多個不同成長背景下的華人基督徒婦女的故事，呈現出一幅複雜而多元的真實

圖像。她認為，從女性主義口述歷史所展開的相關的基督教華人婦女計劃可以是一個對宗教歷史研究的新嘗試，這種研究可以引入文化研究的一些理念考量，即是將研究焦點由思想、價值或精義，轉到實物的、日常生活的、以及普羅大眾的方面，例如在地的信徒如何在多元的處境及其引申出的矛盾和衝突中實踐他們所詮釋的信仰。

黎子鵬教授的論文，則介紹了他正在進行的“晚清基督教中文小說”研究計劃，此研究不僅能豐富我們對中國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學史和翻譯史的認識，並且對跨文化視域的宗教研究尤有參考價值，有助於在華人學術處境中建立“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體系。

對西方社會帶有殖民色彩的東方主義論述的批判已屢見不鮮，但正如蔡源林教授所言，華人社會中也不見得就不存在着對伊斯蘭的另一種形式之“東方主義”。蔡教授與沙宗平教授的兩篇論文，正使得我們的關注視野可以擴大到漢人文化圈之外的宗教傳統。蔡教授認為，有關“東方主義”所引發的學術課題，不只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問題而已，也提供了華人學術界去重新檢討西方學術界的漢學或中國研究所存在的知識與權力關係的課題，並刺激華人學者去反省做異文化研究所可能產生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他主張擴大研究視野，以涵蓋面更大的華人文化圈的伊斯蘭研究來涵攝中國伊斯蘭研究，並將全球各地有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互動的區域包括在內，以便全面探討中伊文明交流的特殊經驗。從中國伊斯蘭教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宗教，可提供不同於以漢民族為本位的傳統宗教史觀點。他還以為若要突破西方本位論述的藩籬，應該從事中國宗教與其他非西方宗

教的比較研究，特別是伊斯蘭教，如此既不會只在自身宗教傳統內劃地自限，又能具有非西方宗教的另一參照角度，以矯正過度倚賴西方學術理論及其問題取向的研究模式，發展出具有東方宗教特色的宗教學。沙宗平教授則是在美國稱霸全球戰略及“妖魔化伊斯蘭”的現實背景下，梳理了東西方學者及穆斯林學者對“吉哈德”一詞的解釋，前者為了說明伊斯蘭教是崇尚暴力與戰爭的宗教，“彰顯”並“放大”其教義；後者為了強調其“和平”與“非暴力”，則“淡化”甚至曲解其含義。沙教授對此現象表示了憂慮，認為伊斯蘭教研究應該盡可能基於客觀的學術立場，減少非學術因素對於宗教學研究的干擾。

首屆華人學者宗教研究論壇得以順利舉辦，我要衷心感謝四所院校的學者們的大力支持與參與，也要對為論壇付出辛勤勞力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諸位同事和宗教學部的研究生們表示謝意。我相信，通過大家的齊心協力，華人學者宗教研究系列論壇將會持續下去，並能夠為華人學術界宗教研究的發展注入一份動力。最後，希望各位讀者能從本論文集集中有所收益，對於我們，也是一種勉勵。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
二零一二年四月

注釋

- 1 關於晚清中國學者受日本學界對西方宗教研究的影響，可參看 Marianne Bastid-Bruguier 著，張廣達譯，〈梁啟超與宗教問題〉，《東方學報》，第 70 冊（1998），頁 329-373；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第 13 卷，第 4 期（2002），頁 37-66；Anthony C. Yu,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2005), 5-25。
- 2 其中，以陳垣（1880-1971）的成就和貢獻最大。即便如此，他也只是將宗教史研究看作“為史學之助”，以補國史之不足。鄭世剛，〈陳垣的宗教史研究〉，收入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3。
- 3 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8），頁 xxvii。
- 4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系於 2004 年，又與文化研究課程合併，成立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 5 胡國楨，〈輔大宗教學系所的發展經驗〉，收入輔大宗教學系編，《宗教教育：理論、現況與前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頁 87-124。

宗教學：
探索華人學者的宗教研究方法

